

同先进人物会见，看到整个地球以至整个宇宙许许多多的新东西，整个文艺园地处处“百花齐放”，天天“推陈出新”。

到那时候，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已经基本驱逐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领导和群众，群众和群众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关系，早已成了社会的新风尚，大家都具有为着社会公众利益进行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并且保证进一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新道德，将成为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规范。随着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人们的劳动兴趣和技能将大大提高，随着集体劳动和集体生活的发展，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将大大加强，全国真正变成一个亲密、和睦的大家庭。那时，虽然个人同集体的矛盾仍将存在，但是个人主义已经变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臭东西；先进同落后的矛盾也仍将存在，但是，将在跟现在不同的、在更高级的形态上进行着斗争，继续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综合上面说的这四个方面，那时，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差别，将逐渐消失，而共产主义的最后建成，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的内容还涉及国际形势，莫斯科会议和南斯拉夫问题，一些地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全国农业纲要四十条以及补选候补中央委员等方面。

大会之后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确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条总路线虽然反映了人民群众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迫切愿望，但从根本上忽视甚至背离了客观规律。因此，八大二次会议没有在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前进，反而从八

89 -

才实学而又诚心诚意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还是少数……我们决心通过交心运动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贯彻到底，拔掉所有的灰旗、白旗，把工人阶级的革命红旗插遍各个角落（例如大学的各个教研室，厂矿的各个科室，各个科学研究所和技术推广站等）。”这个报告还说：会上有人说：“破除迷信没有底，解放思想没有边”，主席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指示，“正象第一个中子打进了原子反应堆，迅速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连锁反应，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报告提出，该省在三、五年内，可能争取平均每人粮食达到1500—2000斤的水平，工业产值可能在三年之内赶上和超过农业产值，到1962年，在1957年的基础上增长6倍，争取达到7倍。那时工业和农副业的产值比例可以达到工六农四，争取工七农三。1958年7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认为“江苏省委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

总之，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宣传高速度思想成为舆论的主调，而实际的“大跃进”运动更是以雷霆万钧之势在全国各条战线全面展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从这里拐了一个大弯儿。

- 91 -

大后退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严重影响。

会议之后，“大跃进”在全国大规模展开，从党中央当时转发的《江苏省委关于传达和学习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情况的报告》就可窥见一斑。这个报告说：八大二次会议之后，省委召开了三届八次全会（扩大），各地、市、县委书记，高校党委书记和省委各部委、各厅局党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报告说：与会者听了传达并进行讨论后，个个精神焕发，心情舒畅，雄心更大，干劲更足，坚信“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能够用最高的速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向共产主义跃进”。报告说：省委全会“首先，大破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度发展的迷信，肯定了农业生产可以一翻再翻。”报告说：当前对跃进的认识已经不成问题了，“但是小跃进还是大跃进，就是增产百分之几、百分之几十，还是一翻再翻的问题，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上还是没有解决的。怀疑派在这上面做文章。”“会议认为，有些人把农业增产问题，说得那么神乎其神，玄而又玄，是一种很大的迷信……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要使产量成倍地翻，必须措施成几倍地翻，干劲成十倍地翻。”“其次，是继续大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念，肯定了地方工业可以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情况下大发展……南京市同志在会上发言，他们要在五年之内，钢的产量达到300万吨，超过人口仅次于我国的东方大象——印度，赶上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比较发达的瑞典的水平。”“第三，是大破了对于‘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科学技术并没有什么神秘，自然科学就是生产斗争经验的总结，把我们现在在生产上所干的一套总结起来，有许多就是最新的科学技术，有些还是世界科学技术的尖端（如我国小麦亩产4000多斤）。”报告还错误地估计知识分子队伍状况，说“从这次交心运动中，暴露出这些道貌岸然的‘学者’，有的对党有刻骨仇恨愿意带着花岗石的脑子去见上帝的顽固分子，有的是一贯崇美亲美的投机政客和实行奴化教育的‘专家’，有的是不择手段弄虚作假骗取名利的大骗子手，有的虽有一些真才实学，但却是以奇货自居，向党内人民讨价还价的贪心分子，具有真

- 90 -

No.5

1958年北戴河会议

韩钢

1958年北戴河会议，是指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大跃进”运动发动起来之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对“大跃进”运动的进一步展开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产生了直接的重要作用。

会议前的形势

北戴河会议前，经过一系列中央会议，“大跃进”运动已经全面地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正如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所说：“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大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从中央到地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实现各项工作的全面“跃进”。

1958年6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为适应建设事业发展的新形势，除了应当发挥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积极性以外，还必须充分发挥协作区的积极作用。决定提出要在中央集中领导下，按照全面规划，逐步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因此，决定提出不但对于财政经济工作要实行分级管理的制度，而且对于建设计划，特别是经济计划工作，还充分采取全面规划、分级平衡、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的方针。决定认为这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地

- 92 -

区域性协作会议的决定已不完全适应形势的要求，提出必须充分发挥各协作区的作用，逐步扩大各协作区的职权。决定规定了协作区的任务，主要是在几个省、市、区范围内对新建大型的冶金、煤炭、电力、机械、炼油、化工等企业进行统一规划和协作平衡；组织工业基础较强的省、市、自治区帮助工业基础较差的地区，实行重点和全面相结合，以点带面的方针，合理地使用各地人力、物力、财力，避免某些基建项目不应有的重复和缺漏；通过协商方式，互相支援，统一步调、千方百计地解决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矛盾和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全国划分为7个协作区，每个协作区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各协作区的领导机构，协作区委员会下设立协作区经济计划办公厅，作为它的办事机构。这7个协作区是：东北协作区（辽宁、吉林、黑龙江），欧阳钦为主任委员；华北协作区（北京、河北、内蒙古、山西），林铁为主任委员；华东协作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山东），柯庆施为主任委员；华南协作区（广东、广西），陶铸为主任委员；华中协作区（湖南、湖北、河南），王任重为主任委员；西南协作区（四川、云南、贵州、西藏），李井泉为主任委员；西北协作区（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张德生为主任委员。协作区成立后，各协作区先后召开了协作区计委主任会议和协作委员会会议，分别讨论了中央和省市委布置的重点建设问题、农业问题和1959年年度计划等。

在决定成立协作区的同时，中共中央于6月2日又作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对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具体办法做了规定。按照这个规定，轻工业部门所属各企业、事业单位除4个特殊纸厂和1个铜网厂外全部下放；重工业部门所属各企业、事业单位大部下放，下放的单位约占全部的60%—70%；各工业部门下放的单位产值（除军工外）约占全部的80%左右。铁道部所属工程局、管理局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邮电部除保留北京通讯枢纽和通各省的长途通讯干线及北京

通各省的邮政干线管理权以外，全部下放；交通部所属公路工程的设计、施工单位，除留必要的部分支援国外以外，全部下放；农垦部除直属3个地方的国营农场外，其余的国营农场均交地方管理；森林工业管理体制改变后，关内的全部下放；粮食、商业部门所属加工企业全部下放。中央要求下放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的交接工作，于6月15日以前一律完成。

随即，中共中央于6月6日批转了冶金、第一机械、化学、水利电力、石油、建筑、轻工、纺织等9个工业部党组关于企业下放问题的报告。据《今日新闻》报道，到6月15日正，上述9个工业部门已经有80%的所属企业、事业单位下放到地方管理，880多个下放单位完成了交接工作。

建立协作区，下放企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目的都在于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6月2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力争高速度》就以发展钢铁生产为例说道：“我们不能安于只有几百万吨钢，我们必须最短的时期内，把钢铁的产量提高到几千万吨。……我们就不得不探求既多快又好省地发展钢铁工业的道路，因为别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们就坚决执行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工业和中小型工业同时并举的政策。”八大二次会议以后，速度问题被提到了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还是上面的这篇社论说：“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象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如果不要求高速度，必然没有什么多快好省的问题，那样，也就不需要鼓足干劲，也就无所谓力争上游了。因此可以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

对高速度强调，导致高指标风的兴起，各部门、各地区对本系统、本地区的生产指标层层加码。5月，华东区召开计划会议，把华东区的钢产量指标加到600万吨。不久以后，各协作区先后召开钢铁规划会议。制定1959年钢铁生产计划，华东区提出生产钢600—700万吨，生产钢的能力达到1200万吨；华北区提出生产钢

600万吨，生产钢的能力达到1000万吨；西南区提出生产钢310万吨，生产钢的能力达到570万吨；东北区提出生产钢1100—1300万吨，西北区提出生产钢100—500万吨，1960年上半年生产钢的能力超过300万吨；华中区初步规划1960年上半年钢的生产能力超过500万吨。6月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取有关部门负责人汇报，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干脆翻一番，即搞1100万吨钢（1957年钢产量为535万吨）。毛泽东还估计，1959年钢产量可能达到2500万吨，两年就可以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6月21日，冶金工业部党组重新提出1959年钢产量计划。这份计划在向中央汇报了各大区关于钢铁生产规划会议的情况后认为：“根据这种情况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约可能争取到八、九千万吨以上。”第二天，毛泽东向各大协作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军委会议各同志转发了这个文件。

钢铁生产指标的加码，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指标的追加。6月中旬，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的报告。报告说，今年工农业大跃进已成定局，现在看，以钢铁为主的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能不用3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有可能3年基本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就是：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的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5年超过英国，10年赶上美国；大大推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在10年内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打下基础。”报告估计，到1967年我国钢产量能够达到1亿吨。6月16日，又向中央政治局提交《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要点》报告。报告预计1958年的财政预算收入，其增长速度将达到35%；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财政收入初步框算为4000亿元，每年平均递增33.8%；二五计划财政支出中，基建投资为3050亿元，占总支出的70%以上。6月17日，国家经委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报告认为：1958年第二本帐肯定可以超额完成，1959年的国民经济可能会有更大

的跃进；这样经过3年苦战，我国就可以在钢铁及其他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农业方面实现水利化，达到“四、五、八”的要求，基本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①6月27日，中央又批转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增加基本建设投资25亿元分配意见的报告》，决定1958年再增加基建投资25亿元。

伴随高指标风的兴起，浮夸风也越来越盛行，其中农业方面的浮夸风尤为突出。7月1日的《今日新闻》报道：1958年全国夏收粮食作物总产量初步统计比上年纯增350多亿斤，达到950亿斤上下。其中冬小麦增产220多亿斤达到640亿斤左右；我国小麦总产量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报道说：今年增产主要是单位面积的产量提高了。去年全国冬小麦平均亩产才112.8斤，今年跃进到180斤左右。每亩千斤以上的高产田，仅据河南、安徽、江苏、陕西、山东五省不完全统计就有20多万亩，并且出现了4000斤、5000斤以上的高产纪录。一时间，报纸、电台、广播里竞相传出亩产高产纪录的“奇迹”。

7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谷城县庙滩乡新气象五社的1.5亩试验田，亩产小麦达5467斤。同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小麦高产纪录是怎样创造的》，记述湖北省光化县白莲乡永进农业社第五生产队李秀兰摘密植，创造小麦亩产3622.5斤的纪录。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保守派”服输记》，介绍河南省商丘县双楼社赵庄队两位青年创造小麦亩产4412斤纪录的事。第二天，《人民日报》报道一个产量更高的纪录：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所谓“双星”是指两个高产“卫星”，一

^① 这三个报告参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148—14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个是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早稻亩产 36900 多斤，一个是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花生亩产 10000 多斤。1957 年我国水稻单季亩产最高纪录是 2400 斤，花生亩产最高纪录是 1500 斤，《人民日报》的社论说：“早稻、花生高产‘卫星’的出现，同不久以前小麦高产‘卫星’的出现一样，是共产主义风格的胜利，是破除迷信、彻底解放思想的胜利。……这又一次生动地证明，‘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奇迹来。”

浮夸风表现的另一方面，是大批“粮食增产有限论”、“定局论”。认为粮食增产要受到天时地利等自然条件限制的观点，被概括成“粮食增产有限论”。而“粮食增产有限论”被认为“是同资产阶级的‘土地报酬递减律’学说和反动的人口论异途同归的”。有人在文章中说“粮食增产有限论”对农业生产极为有害，是“右倾保守派的护身符”。所谓“定局论”，是指一些人认为农作物的生长后期，收成是丰是歉已成定局。这种观点从防止松劲情绪的角度看，是应该批评。但是当时主要是把“定局论”作为妨碍全面丰收的思想来批判的，把“定局论”当成了农业生产上促进派的对立面。这些批判反过来助长了虚报、浮夸之风的蔓延。

就在这个过程中，急躁情绪也开始在变革农村生产关系方面表现出来，并逐渐形成“共产风”。6月，《红旗》杂志 1958 年第 1 期公开发表这年 4 月 15 日毛泽东写的一个批示，题为《介绍一个合作社》。毛泽东说：“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个别地方即试办过共产主义公社。7月，《红旗》杂志第 3 期发表陈伯达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随后第 4 期又发表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庆祝党成立 37 周年大会上的讲演，题为《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这两篇文章向外界透露了毛泽东关于公社的思想。文章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

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陈伯达在文章里说：“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的结论。”“很显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在这样‘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普遍高涨的时候，人们已经可以看得见我国将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为期不远的前景。”建立人民公社，不仅仅是生产关系变革的设想，而且也被当作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途径。

建立人民公社的最早实践，还是从农村开始的。河南省新乡县成立了七里营人民公社，遂平县成立了嵖岈山人民公社，这是最早的农村人民公社。8月6日，毛泽东视察了七里营人民公社。8月9日，毛泽东在视察山东历城县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关于办人民公社的思想和谈话公布之后，一些农村争先恐后模仿七里营、嵖岈山一创办人民公社。比如，河南很快形成了并大社的浪潮，信阳专区全区并成了 200 多个大公社，全省约并成 1500—2000 个，每社平均 5000—7000 户^①。

在农村，还出现了农业社公共食堂。最早是湖南邵阳、桃源县，湖北公安县和福建安溪的部分农村，农业社在生产紧张、劳力短缺情况下，根据社员自愿参加的原则采取的一种办法。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这件事要提倡》认为：“湖南、福建等地一些农业社开办公共食堂，集体吃饭，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农村新事。它标志着农民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上的新发展、新趋向。在

① 李友九，《河南信阳来信》，1958 年第 7 期《红旗》。

个体经济时代，农民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适应着这种分散的个体经济制度，吃饭也是一家一灶。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广大农村已经合作化，生产再不是以家庭为单位，而是以社为单位在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和广泛开展着的技术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村经常处于紧张的突击状态，劳动力普遍感到不足。集体的生产和紧张的劳动，必然要求有同它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由一家一灶发展为公共食堂，正是这种要求的反映。”农村公共食堂的兴办，使得平均主义之风也开始滋长起来。

总之，北戴河会议之前，左倾错误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在毛泽东看来，经济建设主要是抓住钢铁和粮食。8月11日和12日，毛泽东在视察天津时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当时，由于正处于夏收，粮食问题不突出。许多人甚至认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毛泽东还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但是钢铁的问题则不然。由于追求高指标，许多地方和部门、企业只注重搞计划，而忽视抓生产，各地“我自为政”，中央指挥调度不灵。更重要的是，由于生产指标的层层加码，使生产能力和生产产量的实际情况，与计划指标的距离越来越大。到7月份，钢产量只完成 380 万吨，离 1100 万吨的年产量指标悬殊很大。这引起中央领导人的担心。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为了促进全面跃进的进一步实现，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北戴河会议。

会议的概况

1958 年 8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北戴河会议的通知，决定于 8 月 16 日举行会议，要求参加会议的各同志于 15 日以前到达。通知还付了会议要讨论的问题：

- 1、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题
- 2、今年钢、铁、铜、铝问题
- 3、明年农业问题

- 4、明年水利问题
- 5、合作化问题
- 6、今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
- 7、教育问题
- 8、干部参加劳动问题
- 9、劳动制度问题
- 10、570 万人去边疆问题
- 11、技术保密问题
- 12、国际形势问题
- 13、今冬、明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 14、协作问题
- 15、深耕问题
- 16、肥料问题
- 17、民兵问题

8月17日，北戴河会议正式开始，8月30日结束。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的主要负责人。8月25日至31日，中央还同时在北戴河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除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外，还有各省、市、自治区计委主任和有关厅、局的主要负责人。8月30日，参加工业书记会议的代表旁听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在最后一天大会上的讲话。

北戴河会议讨论的问题，毛泽东在会议第一天的讲话中作了说明。毛泽东说：这次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每省和自治区的负责同志都参加。第一个问题是明年和第二个五年经济计划问题，主要是工业计划问题。这是重点、主题。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工业会议，农业、商业也有一点。第二个问题，今年的问题也是工业的问题，铁、钢、铜、铝的问题。钢由 1957 年的 535 万吨翻一番，达到 1100 万吨，到年底只有 4 个月零 13 天了，有完不成的危险。要保

证完成。中心问题是搞到铁。第三个问题，明年农业问题。第四个
问题，明年水利问题。第五个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第六个问题，
今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问题。粮食产量今年
可能达到 6500 亿斤，一说 7000 亿斤，6.5 亿人口，每人 1000 斤。
明年每人争取达到 1500 斤，后年达到 2000 斤。是否搞到 2800—
3000 斤，到底多少好，以后再议。是否无限制地发展粮食，恐怕超
过每人 3000 斤就不好办了。第七个问题是教育问题。第八个问题
是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包括我们在座的，每年参加劳动一个月总
是可以的。第九个问题，是劳动制度问题。第十个问题，从明年起，
搞 570 万人去边疆问题。第十一个问题，是技术保密问题。第十二
个问题，是国际形势问题。这个题目是我出的，因为到处有人问会
不会打世界大战？打起来怎么办？恐怕不会打。还是西方怕我们
多一点。党外都有怕西方的情绪，有恐美病。第十三个问题，是
今冬明春在农村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问题，要搞大辩论、
大字报。第十四个问题是协作问题。第十五年问题是我提出的，深
耕问题。目前，总而言之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不深耕，水装不
了，肥放不进，不能分层施肥，肥再多也不行。深耕可以使土地变成
个天水库，天肥料库。北方要深耕 1 尺，南方七、八寸。密植的基础
是深耕，深耕有利于除草，把草根挖掉又有利于除虫，草翻到底下
又可以变成肥料。这样一来可以一亩当三亩，我们的土地多了。苦
战 3 年之后，土地的观念要改变，用不着那么多地。将来可拿 1/3
的土地种树，有 2/3 的土地就够了。人口的观念要改变，现在是人
少，不是人多了。过去我说搞 8 亿，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
紧，不成问题。但也不要提倡多子女。人民文化水平提高以后就会
真正节育了。第十六个问题，是肥料问题。第十七个问题是民兵问
题。搞大合作社，工农商学兵一套都有。用 6 年时间 4 人发一支枪，
全国共 1 亿支枪，每人一年发几十发子弹，下一道命令必须打光，
不打光不算完成任务。全民皆兵，有个壮气作用，吓人作用。

与会者根据会前的安排，围绕计划和工业生产问题，对上述

— 101 —

6、《中共中央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

7、《中共中央关于储备粮食问题的决定》。

8、《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社积累与消费问题的指示》。

9、《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农、林大专学校教育的指示》（作为新闻发表）。

三、关于财贸方面

1、《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改进财政管理体制和相应改进银行信贷管理体制的几项规定》（由国务院发布）。

2、《中央批转粮食部党组关于 1958—1959 年粮食购销问题的报告》。

3、《中央批转商业部党组关于 1958 年棉花、麻类、烤烟收购数量的初步意见》。

4、《中央批转粮食部党组对 1958—1959 年度油脂购销调拨计划安排的意见》。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市场物价分级管理的规定》（由国务院发布）。

6、《中央批转李先念、程子华同志关于物价会议向中央的报告》。

7、《国务院关于农副产品、食品（不包括粮食油脂）分级管理的规定》（由国务院发布）。

8、《中央关于发展中药材生产问题的指示》（改为国务院指示，由国务院发布）。

9、《中央关于对外贸易必须统一对外的决定》。

10、《中央关于贸易外汇体制的决定》。

四、关于教育方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

五、其他方面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由

— 103 —

17 个问题逐一进行了讨论。8 月 17、19、21、24、29、30 日，毛泽东在会上先后讲话，其中 19、21、24 日是他同各大协作区委员会主任的谈话。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也在会上作了讲话或插话。李富春就 1959 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薄一波就工业生产问题，谭震林就农业问题、陆定一就教育问题分别在会上作了说明和发言。除了前面所述的 17 个问题之外，会议还讨论了交通运输问题。会议还涉及整风问题及其他一些问题。会议采取逐日讨论、逐个通过的办法，先后通过了 40 个文件。目录如下：

一、关于计划和体制方面

1、《中共中央关于 1959 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

2、《1959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示》。

3、《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

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进计划管理制度的规定》（由国务院发布）。

5、《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协作的几项具体规定》。

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进物资分配体制的几项规定》（由国务院发布）。

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进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审批办法的规定》（由国务院发布）。

8、《关于纺织机械企业领导问题的决定》（由国务院发布）。

二、关于农村方面

1、《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发表）。

2、《中共中央关于 1959 年农业生产安排的决议》。

3、《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标》（《人民日报》发表）。

4、《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

5、《中共中央关于肥料问题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

— 102 —

国务院发布）。

2、《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

3、《中共中央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

4、《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展开除四害运动的决定》（《人民日报》发表）。

5、《中共中央关于技术保密问题的规定》。

6、《中央批转劳动部党组关于劳动工作分工管理向中央的请求的报告》。

7、《中央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企业单位职工宿舍冬季取暖补贴问题的指示》。

8、《中共中央关于发展铜和铝生产的决定》。

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铜、铝工业的指示》（由国务院发布）。

除此以外，北戴河会议还决定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停办一年。

北戴河会议讨论的问题、制定的文件很多，但是中心问题是工业生产问题，其中钢铁工业生产的问题更为突出。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会议始终是围绕上述两个重点进行讨论的。

毛泽东和部分同志的讲话

第一、关于工业和计划问题

这是毛泽东讲话的重点之一。他说：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他对与会者说：你们回去后，什么事情也不搞，专门搞几个月工业。不能丢就不能专，没有专就没有重点。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亩产卫星不要过分重视。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大工业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集中力量把大工业搞起来，抓主要的东西。要下紧急命令，把铁交上

— 104 —

来,不许分散。大中国钢厂的产钢计划必须完成,争取超过。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工、农、商、学、兵都有,重点是工业。全党全民办工业,从今以后,第一书记要偏向工业方面来,过去我们偏向农业方面,拿农业压迫工业,将它的军,农业搞起来,农业上了轨道,工业没有上轨道。工业要抓,有人说,睡到工地上,睡到机器旁边去,就可以搞起来,不到机器旁边睡觉不行。东北三省过去抓工业,但农业未搞好。东北要一面抓工业,一面抓农业。其他各省、各自治区重点抓工业。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是指抓工业,首先是钢铁、机械。

钢铁生产是毛泽东多次讲话的内容。他说,今年还有四个月,从8月21日起到年底还有133天。我犯了错误,早抓一个月就好了,6月19日出了题目,但没有具体措施,大家都抓计划去了,热情是好的,但对今年的生产有所放松,我没有搞好,责任是我的,不是大家的。从8月21日起,还有19个星期,133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现在又过去10天,相当危险,要紧急动员,能否完成,我有怀疑。我是“观潮派”,明年1月1日能不能搞到。一是题目出错了,二是工作没有抓紧,是我的错误。冶金部汇报原计划600万吨,以后又讲700万吨,后又进900万吨。我说:索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搞1100万吨。问了许多人,都说可以,有希望。今年1100万吨钢,到底扎实不扎实,我是怀疑的,拿到手才算数。“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明年3000万吨,后年再增2000万吨,苦战3年,达到5000万吨,基础就可起来了。剩下两年,到1962年搞到8000万吨到1亿吨钢,就赶上美国了。毛泽东说: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为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为四个美国。毛泽东把这个过程定为7年,第一段苦战三年,第二段再苦战两年,再还要两年,那时搞到1—1.5亿吨钢,超过美国。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统一和纪律。毛泽东说:“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全国、省只能搞一个计划),重点建设,枝叶

- 105 -

吨,第三本帐是八大二次会议订的850万吨,第四本帐是6月19日提出的1100万吨。第四本帐下达时间很晚,许多大工厂都没有完成任务,原因之一是从部起相当多的工厂偏重于搞计划,忽视搞生产,主席批评是对的。二是调度不灵。一种是许多小高炉是农民搞的,掌握生产需要一定时间,生产不稳定。另一种是许多厂子的生产没有完成,原因是成都会议提出分成,工厂按分成比例留下使用了。再有一种是许多厂子是6月15日下放的,上下交接在过渡,同时冶金设备不能正常供应,有些厂子得不到原材料,不能迅速生产。

刘少奇在讲话中也强调了集中。他说:全国一盘棋、一本帐,都应列入全国计划。我们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各地方都要走向平衡,各地方各单位都要走向平衡,各地方一部分或者大部分都能自给自足。集中领导,集中调配,应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邓小平在讲话中也说到要确定一个计划,保证重点,语言一致,不靠全面计划、统一计划是不行。

第二,关于建立人民公社问题

毛泽东说:人民公社问题,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我的意见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养猪都归公,自留地暂时还留一点),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的级别待遇比较复杂。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苏联片面强调物质刺激,搞重赏重罚。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

谈到我国人民公社的由来,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

- 107 -

扶持(枝干相联)。”分级是在统一计划下,小部分中央管理,2/10(投资利润都可归中央);大部分归地方管理,8/10。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不妨碍重点的大家搞,凡是妨碍重点的必须集中,毛泽东还说,所有计划统统要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有几项东西,非下命令不可了。以后评比要比完成任务,比技术创造,比工作方法,比组织纪律性,比更有秩序,比合理的独裁。现在铁也调不出,钢也调不出,全国有几十个政府,那还得了。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一个地区一个主,一省只能有一个头,叫做“冤有头,债有主”。要逐级搞平衡,逐级上报,社向县,县向专,专向省,这叫社会主义秩序。他说:三令五申,凡有铁拿不出来者,要执行纪律。对搞分散主义的,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察看,六开除党籍。不然反而不利。毛泽东说:这几条都是神经线,不可少,是属于惩罚一类的性质。九个指头是说服,靠马克思主义,靠开会,靠政治,凭“良心”办事,一个指头是纪律。

毛泽东在讲话中也谈到统一与分散、“死”与活的关系。他说:“死”呢?没有死不行,统得太死也不行,一点不死也不行。1959年的钢如果是2700万吨,2500万吨必须卡死,200万吨是活的;如果是3000万吨,就有500万吨是活的;如果超过3000万吨,还可以分成。死者保证重点,活者重点之外不防碍重点。大包干就是有死有活,大家都要管。死与活两方面就是统一与分散兼而有之。包干制就是有死有活的矛盾统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就是这个道理。毛泽东总结说:要有死有活。统一计划,分散管理。各级办工业,全民办工业,有重点,有骨干,有枝叶。

陈云在会上的讲话对钢铁生产的形势做了估计和分析。他说:今年的钢铁生产计划能否完成,很担心。7月份只完成了380万吨,离1100万吨还很远。钢铁第一本帐620万吨,第二本帐710万

- 106 -

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起来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都未料到。共产主义本来是有群众自发的因素,先有空想社会主义、古典唯物论、辩证法,然后再有马克思那些人总结出来的。我们的人民公社是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是没有来由的。把这个问题条理化,需要我们去搞清楚。但是,毛泽东又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几个按语,都说办大社好,山区也可以搞大社,多种经营综合发展,开始办小一些也有好处。1955年我就提倡办大社。全国搞15000个到25000个社,每社5000到6000户。两、三万人一社,相当大了,便于搞工、农、商、学、兵与农、林、牧、付、渔这一套。

北戴河会议讨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对此,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当决议草案发下去,每一县搞一两个试点,不一定一下铺开,也不一定都搞团、营、连、排、班。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自留地要增加,耕畜要私养为主,大社要变小社等几件事,是向富裕中农让步。经过这个过程是可以的,不算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在当时条件下还有某些积极意义,现在又否定了。社以大为好,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许多社合为一个大公社。毛泽东认为:共产党讲话过去讲的都灵了,抗日、打蒋介石、土改、合作化都灵了,农民相信。这次提出办公社,全民所有制,农民也会很快接受。

关于人民公社的内部结构,毛泽东很欣赏河北省徐水县的经验,河北徐水搞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在公社内部设团、营、连、排、班。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搞军事化,我看是好的。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生产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似乎一讲军事就没有民主,恰好民主出在军队,即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斗中可以互助,首长压迫士兵在我们军队中是犯纪律的,不名誉的。公社“三化”很

- 108 -

好。人民公社军事化，并不是资产阶级军事化，有纪律，有民主，相互关系是同事关系，是说服不是压服。

毛泽东把人民公社看作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重要途径。他说：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那时道德大为进步，劳动不要监督，要他休息不休息。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萌芽，是资产阶级法权制度的破坏。过去革命打死很多人，是不受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大变化。大概10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将来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如鞍钢叫鞍钢公社，城乡一律叫公社，大学、街道都办成公社。乡政合一，政社合一，挂一个牌子。

刘少奇在讲话中也说到，公社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但是，刘少奇也指出，社的规模大小和快慢，由各地决定，不要性急，不要强迫，要大鸣大放。建立公社有些地方要分两步、三步走，有的地方不必要。公社建立后，商业就不要了，只要一个批发部。

谭震林在会上介绍了一些情况。他说：人民公社，先要大，小了不行。另一个是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名称也有各种各色，有的叫国营农场，有的叫东方公社，有的还叫农业合作社，但规模很大。这个问题我们向主席汇报了，主席也提出了一些指示。根据主席的指示，写了这么一个意见，这个意见送到主席那里又改了一下。这个东西产生的时间并不很长，虽然以前也有大社，但并不太多。成都会议作了小社并大社的决定，会后各地方采取了一些行动。比较快点的是辽宁、广东，接着是河南、河北、江苏、浙江也作了规划，其他省份也作了些规划，并得快的是辽宁，全省都并完了，一个省并成了1400个社。河南现在也差不多快完了，全省原来是2000多个社，并成一千几百个。河北估计8月底也完了。

— 109 —

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要打成一片，要说服，不要压服。多年如此，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我们从来就讲：上下一致，官兵一致。供给制比较平等，衣服差不多。但进城以后变了。城市恰恰要推行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这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也忘掉了。是不是由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我们已相当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要强调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毛泽东强调干部要参加劳动。他说道：不劳动不好，官作久了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还有几千万干部子弟，近水楼台易做官，搞久了我们也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说：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丰富，第二个条件是要有共产主义精神，一有命令，每个人都自觉地去工作。有人说，平均主义不分高低，要出懒汉。共产主义不分高低，我们有22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没有懒汉，不发薪水，与苏联不同，苏联叫余粮征集制，我们没有搞。我们叫供给制，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三大民主。我们原来分伙食尾子，津贴。进城以后，熬了3年，到1952年搞了薪水制，说资产阶级的等级、法权那样神气，把过去的供给制说成落后的办法，游击习气，影响积极性。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发展资本主义思想。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发过来的吗？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在一元化领导之下，没有什么“花”，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打美国的时候也没有“花”。现在有“花”，发薪水都要等级，分将、校、尉，可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跟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

— 111 —

第三，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从人民公社的建立，讲到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农民先走一步。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还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毛泽东说：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整风以来，资产阶级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取消薪水制，一条有饭吃，不死人，一条身体健壮。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马克思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的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毛泽东说：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恢复供给制好象倒退。“倒退”就是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毛泽东说：八级工资制这也是资产阶级法权制度的表现。现在不分级，工资一律也不行。将来要实行各取所需，无所谓八级工资制，要做到没有区别，而现在又搞那么多的区别也不好。例如，看剧，凳子分几级现在就可以取消，这个问题大概可以跟农民说清楚。农民要当兵，就是因为没有饭吃，就要搞社会主义。当兵，打仗要死人，搞供给制他都来，搞共产主义，取消等级制，搞供给制，大概在农民里面也容易说清楚。我们过去二十几年搞供给制并没有出懒汉，而且打仗还是死人的，还不是靠政治挂帅？！那也不是少数人，当时实行供给制的人数有几百万。战争中组织民兵坑道作战，没有报酬，拼命打仗。徐水县能够搞军事化，也是因为这个经验。但是进城以后说供给制不行了，要实行薪水制，说它能够刺激生产，结果由军事共产主义倒退一步，向资产阶级法权让了一步。现在还是要靠政治，政治和科学结合。

毛泽东还由此谈到干部问题。他说：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

— 110 —

人、农民不喜欢我们，说“你们是官——党官、政官、军官、商官、工官”。其官之多，怎么不出主义？官气多，政治少，所以出官僚主义。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三四年（明年、后年）内能不能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把农业工厂化，实行工资制，土地国有行不行？有个文件写第三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我加了个第四、五个五年计划。刘少奇插话：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过渡。毛泽东说：讲开始过渡还可以。

第四，关于上层建筑问题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谈到法治问题。他说：历史唯物论关于上层建筑的问题，是政权问题，已经解决了。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人民公社是几个好人中加一个坏人，这就专了政，六亿人口中只有130万劳改犯不算多。毛泽东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刘少奇插话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的参考，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就是法。毛泽东接着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官人治不了，实际上是1400人的大会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搞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

毛泽东还讲了意识形态问题。他说：意识形态、宇宙观、方法论、报纸、文化教育的作用大得很。资产阶级的自由破坏得越多，无产阶级的自由就越多。苏联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没有彻底破坏，因而

— 112 —

没有充分建立起无产阶级的自由。我们政治思想的革命搞得比较彻底，干部参加生产，和群众打成一片，彻底改革规章制度，就是对资产阶级自由的彻底破坏，工人的干劲冲天。毛泽东说：意识形态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关心基础，为基础服务，改革规章制度，开会就是搞意识形态。北戴河会议就是搞意识形态。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大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不正确的反映客观规律危害很大。

毛泽东还谈到学校教育：学校教育要和劳动相结合。我们的农业学校要统统搬到乡下去，农业学校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一切学校都要办工厂，天津音乐学校办工厂，炼铁炼钢，很好。刘少奇在讲话中也说：学校要和工厂结合，工厂办学校，半工半读，学校办工厂。

毛泽东还说：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新写。我们解决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先搞农业，同时搞重工业。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之争，就是说重工业多了。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先搞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先搞绿叶，后搞红花。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有新的补充和发展。生产关系中的三个方面，所有制、劳动者的相互关系和分配问题，都来展开。苏联的集体农业、手工业合作社还是集体所有制，为什么不搞全民所有制？毛泽东说：《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一书（斯大林办的不大好），请各省都印，广为散发，让大家看一下，一很有启发，二但又相当不足，因为受那时条件限制，没有经验，所论当然模糊不明确。要破除迷信，不要以为老祖宗都放香屁，一个臭屁也不放，讲到将来，是一定有许多模糊地方的。苏联有41年的经验，我们有31年的经验，要破除迷信。

毛泽东还谈到要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他说：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是资产阶级批斗我们的，或者是苏联正规化来对我们批评。实际上，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才是正规化的马列主义的作风。这样大的事情，不搞运动怎么行？办工业和办农业一样，不能由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做，必须由全党和广大人民去做。要依

— 113 —

斤，钢产量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铜40万吨，铝30万吨，机床产量达到30万台，发电量达到550亿度，煤产量达到3.7亿吨，石油产量达到800万吨，水泥产量达到3000万吨，化肥产量达到530万吨，棉纱产量达到1000万件，新建铁路1.05万公里。为了实现这些指标，并且为1960年的建设作准备，在预计的1959年国家财政收入的722亿元中，用于基本建设投资将为500亿元；地方和企业的用于基本建设的自筹资金在外。实现1959年这个计划，我国的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等少数几种以外，都将超过英国；1956年到1967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和棉花的指标，都将提前8年超额完成。

决定说：在1959年计划的基础上，准备在1960年使粮食产量达到13000亿斤左右，钢产量达到5000万吨左右，在科学技术方面基本上掌握原子能技术和喷气技术。经过1958年、1959年、1960年这三年的苦战，再加上以后两年的继续努力，即到1962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可能使粮食产量达到15000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8000万吨至1亿吨，并且提前5年实现12年科学规划，在主要的科学技术部门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这就是说，在1958年到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提前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决定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全国建立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同时，各协作区都应当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各有特点的工业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也都应当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工业基础。全国和各地方在建设工业体系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合理地分布工业生产力，按照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在目前多建中小企业的方针，使企业的布置适当分散，以适应国防安全，特别是适应逐步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全国走向平衡发展的共产主义要求。

决定要求统一计划，分级管理，保证重点建设，加强协作，共同

— 115 —

靠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我们就是要搞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此外，毛泽东还谈到除四害的问题。他要求对此要抓一下，他说：那一天中国消灭了四害，要开庆祝会的，历史要写进去。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办到，所谓文明，可是苍蝇、蚊子多得很。

会议主要文件的基本内容

北戴河会议的主要文件，在会议结束之后分别由国务院公布和《人民日报》发表。这里就不再概述了。除了已公开发表或公布者外，北戴河会议的另一重要文件情况如下。

一、《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

1959年计划和二五计划是第一次大协作区会议之后，国家计委、经委的有关同志经过5天时间搞出来的，然后提交中央政治局作了初步讨论。之后又经过两天的突击作修改，再次提交中央政治局作初步讨论，作为初步草案提交各大协作区会议讨论。经过各大协作区会议讨论后，又提交北戴河会议讨论。会上，毛泽东、刘少奇等都提出要调整计划的意见。根据这个意见，国家计委对原计划作了4个方面的调整，一是调整项目，重大项目增加148个，减少38个项目，净增118个项目；二是调整收入和投资，投资比原计划的480亿增加了21.22亿元，财政收入增加了22.5亿元达到722.5亿元，其中地方增加了15亿元，中央各部增加了7.2亿元；三是保证重点，电力由原来520亿度增加到580亿度，保重点，保生产指标，保新增生产能力，四是预算外投资各省要做计划。另外，二五计划也作了调整。

会议最后通过了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目标是：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到10000亿

— 114 —

负责。决定要求各级党委抓紧1958年最后4个月的工作，特别是要保证完成1100万吨钢和冶金设备、发电设备、机床的生产任务。决定指出：在保证今后农业继续跃进的条件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当立即把主要力量转到工业战线上，要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由第一书记挂帅，抓紧工业的生产和建设的工作，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搞技术革命，大力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采取能够迅速发挥作用的措施，开展评比、竞赛运动，交流经验，以便在尽短的时间内，在全国掀起一个工业生产、建设的新高潮。

《1959年度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是对上述文件的具体化。1959年工农业总产值为3516—3706亿元，比上年增长68%，其中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为2060亿元，比上年增长91%；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为1456—1646亿元，比上年增长44%。1959年财政收入为722.5亿元，其中基建投资支出预算为501.22亿元。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是国家计委党组提出的。《意见》说：1962年的工业总产值约为5700亿元，将比1957年增长7.4倍左右，平均每年增长53%左右（比1958年预计数增长4.3倍左右，平均每年51%左右）。1962年农业总产值约为2400亿元左右，将比1957年增长2.5—2.8倍，平均每年增长30%左右（比1958年预计数增长1.2倍左右，平均每年增长70%左右）。在1962年工农业的总产值中，工业的比重将达到70%左右。《意见》说：第二个五年计划合计的基本建设投资约需3850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增长6.8倍左右。重大建设项目，初步安排1000个以上。需增加职工2800万人左右。

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协作的几项规定》

这个文件强调经济协作的计划性和组织性，对经济协作作了三条规定：

1. 所有列入国家计划的协作任务，必须由协作双方具体订立合同，严格执行，保证按时完成。
2. 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之间现有的协作关系必须继续保

— 116 —

持。某些协作关系需要改变的时候，必须进行协商，双方同意后，再加以改变，不得单方面废除。

3. 凡是超过省、市、自治区界限而未列入计划的经济协作，包括技术力量的支援和培训，必须统一归口，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互相协商解决，并报有关的中央机关备案。各专区、县、乡、社和企业单位不得直接向其他省、市、自治区的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提出协作要求，以免影响正常计划的执行。

三、《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安排的决议》

《决议》指出，1959年农业生产安排的方针是，在保证粮食总产量达到8000亿—10000亿斤的前提下，扩大棉花播种面积到1亿亩，总产量达到8000万到1亿担；大力增产油料作物，保证1960年生产年度生产600万吨食用植物油的原料；并且要注意粮食品种和各种小杂粮的生产，注意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和蔬菜的生产。在数量大体满足之后，应该注意质量和花色品种，以适应人民的生活习惯和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需要。

关于粮食生产，《决议》认为主要关键是：增加小麦和早稻的播种面积，提高夏收作物在全年粮食总产量中的比重；实行以深耕、密植为中心的深耕细作，努力提高亩产量。《决议》提出了几项措施：①增加小麦和早稻播种面积。冬小麦由1958年的3.5亿亩扩大到4.5亿亩，春小麦由1958年的5000万亩扩大到1亿亩。早稻由1958年的1.5亿亩扩大到2亿亩。整个夏粮作物播种面积达到8.5亿亩，粮食产量达到4200亿—5700亿斤。②薯类的播种面积不宜再扩大，而要合理分布。1959年全年粮食播种面积17.7亿亩，总产量可以达到10000亿到13000亿斤。③提高亩产量是今后农业生产的中心任务，1959年要力争单季亩产千斤粮食，小麦千斤亩应占播种面积的10%到20%，早稻千斤亩应占播种面积的5%，其中有20%是1500斤亩，其他夏粮作物的千斤亩，也应该占播种面积的10%到20%，万斤薯应该占播种面积的20%到30%。

关于棉花生产，《决议》提出1959年计划把棉田扩大到1亿

— 117 —

于鼓励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增加不可过多。农业社社员的平均收入水平，不应该超过当地普通工人的平均收入水平。有的社收入很多，已经普遍超过了这个水平的，要向社员解释清楚，不再增加社员的个人收入。有的社收入低于当地富裕中农的平均水平，应该根据今年的增产程度，增加社员的个人收入；但是，必须增加一定的公共积累，以适应扩大再生产的需要。

《指示》说，根据以上的原则处理之后，不少的社积累的比例可能是很大的。迅速增加的公共积累，首先应该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增加基本建设，扩大再生产。公共积累，除了用于本社的生产事业和集体福利事业以外，还应该采取县联社统筹资金的形式或者其他适当的形式，抽出一一定的比例，用于全县、全省、全民的生产事业或者文化、教育、福利事业。这也要向农民解释清楚。

六、《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

《决定》说，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到人民公社的时代，为实现全民皆兵提供了空前优越的条件。因此，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把生产、工作、学习的组织军事化，把全民武装起来，工、农、商、学、兵结为一体，实行全民皆兵，把军队的后备力量建立在全民的基础上，这对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都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

《决定》说，全民皆兵，就是以人民公社为单位，逐步实行全民武装。1962年，预计全国有7亿人口，除了地、富、反、坏、右和残疾人员之外，把年满16岁至50岁的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都组织在民兵之内，预计约3亿左右。其中又以复员退伍军人作为骨干，把年满16岁至30岁的男性青壮年组成基干民兵，预计大约5000万。在农村中，以人民公社为单位，根据生产组织情况和民兵多少，以基干民兵为主，编为民兵大队、中队、小队。在城市，以厂矿、企业、学校、机关为单位，或者视城市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以人民公社为单位，建立民兵组织。这种武装起来的人民，既是民，又是兵；既是生产队，学习队、工作队，又是战斗队。

— 119 —

亩，亩产皮棉平均达到80—100斤，500斤亩应该占播种面积的50%到10%；总产量达到8000万—1亿担，每人平均皮棉15斤。

关于油料作物生产，《决议》提出扭转其落后和被动的局面。1959年的油料生产，要求提供生产食油600万吨的原料。1958年冬油菜和1959年春油菜的播种面积要求扩大到5000万—6000万亩，平均亩产200到250斤。花生发展到4400万亩，平均亩产300到350斤。大豆恢复到1.8亿亩，平均亩产200到250斤。以上三种作物，都应该使千斤亩占播种面积的15%以上。

关于畜牧业，《决议》要求1959年底毛猪存栏数达到5亿头，屠宰数达到2亿头，大牲口达到1.05亿头，羊达到1.7亿头。

四、《中共中央关于储备粮食问题的决定》

《决定》认为，今年我国农业空前高额增产的形势已成定局，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有粮食近1000斤。《决定》认为，这种新情况表明我国的粮食局势，已经开始根本改变，从而有可能也有必要有计划地进行粮食储备。《决定》指出：粮食储备应该以农业社储备为主，同时，国家也应该作必要储备，原则上80%由农业社和农户储备，20%由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储备，根据可能和需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全国争取储备粮食4500亿斤左右，相当于7亿人一年口粮和十几亿亩耕地一年种子的需要，其中1958年应该争取储备粮食1000亿斤。

五、《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社积累与消费问题的指示》

农业社积累与消费问题，是北戴河会议讨论的议题之一。会上，一些同志提出公社积累要扩大。有的同志谈到积累与消费问题时，提出将生活水准放在当地富裕中农的平均水平。会议最后通过的这个文件认为：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原则，应该是：在苦战3年期间，尽可能地积累一些，以利迅速发展生产；同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社员的生活有适当的改善。改善社员生活，主要靠扩大集体福利事业，而不是单纯地增加社员的个人收入。《指示》说：1958年社员个人的实际收入，一般应该比1957年略有增加，以利

— 118 —

《决定》还对民兵组织的体制、领导方式、各项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作了规定。

七、《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公报》

这是1958年8月31日由新华社公布的，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公报介绍了北戴河会议的简况。公报说，会议指出，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将使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达到6000亿斤至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至90%；棉花将达到7000万担左右，比1957年增产1倍以上。

公报说，会议决定，全国的省和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就必须首先注意工业的领导，但是同时不应当放松农业的领导。按照今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所通过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今年钢产量是620万吨，比去年增产85万吨，这个数字早已显得不够了。今年5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把今年的钢产量增加到800万吨至850万吨。现在看来，这个数字仍然嫌低。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的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

公报说：会议热烈地讨论了在全国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会议指出，把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和改变成为规模较大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乡社合一的、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是目前农村生产飞跃发展、农民觉悟迅速提高的必然趋势。人民公社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将发展成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人民公社的建立必须是在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必须通过群众的鸣放辩论。

公报还强调了高速度发展经济，既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又要严格保持全国范围建设事业的计划性、纪律性。

— 120 —

北戴河会议对当时的各项工作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是加速了“大跃进”运动步伐，特别是掀起了“大炼钢铁”的运动。北戴河会议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炼钢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为炼钢“停车让路”。在“土洋结合”的方针下，一方面拼命提高各大中钢厂的生产指标，另一方面在全国各地推广“小（小转炉、小平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的炼钢经验。各地党委以第一书记挂帅，广泛动员社会各行各业支援炼钢。据1958年9月1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介绍，在生铁方面，仅9月上旬全国各地建成的土高炉和小高炉有11万多个，使土高炉和小高炉总数达到35万多个。全国各地约9000万人脱离本职工作，投入炼钢炼铁的运动。大批的工人、学生、士兵、教师、居民为炼钢炼铁找燃料，找原料，以至砸锅炼铁，把家庭日用的钢铁成品也当作原料回炉。大炼钢铁的运动，一是导致了工业内部结构的失衡，过分偏重于钢铁生产，使能源、运输、铁路、电力等行业全面紧张，纷纷告急；二是很费了许多森林、矿产资源，由于生产技术落后，生产设备原始，土炉炼出的铁基本上是废品；三是破坏了其他行业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

其次是直接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北戴河会议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之后，零星个别的人民公社的建立便成了铺天盖地而来的高潮。各省在会后未经过充分准备，就匆忙进行并小社转公社的工作。据1958年10月1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村基本实现公社化。全国农村共有人民公社23397个，参加公社的总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0.4%，平均每社4797户。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规模都相当大。据10个省、市的统计，5538个公社中，5000户以下的公社有3343个，5000—10000户的公社有1628个，10000—20000户的公社有516个，20000户以上的公社有51个。此外，据13个

- 121 -

阶段，实现按需分配时，才能完全消除。马克思是在抽象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他没有否定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没有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同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混为一谈。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把按劳分配、工资制等列入社会主义社会要取消的对象，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原意的误解。其一，他把按劳分配中等量交换劳动原则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似乎按劳分配本身就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利，把马克思在特定的抽象意义上使用的、不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权利”，同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混为一谈，从而模糊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同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的本质区别。其二，他把消费资料的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几乎全部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都有“资产阶级权利”。其三，他把对共产主义社会来说应当否定的按劳分配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破除的弊病。毛泽东的理论上的误解，在理论上造成了混乱和错误，在实践中也导致了严重后果。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达到顶点。

再比如法治与人治的问题。法制完备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健全法制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同社会主义社会应具有比资本主义社会先进得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样，社会主义社会也应该具有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健全同时远为先进的法制。同时，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纪律、政策同社会主义法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有不同的功能和不同的适用领域，但是却不能相互混淆，也不能彼此替代。在纪律约束、道德规范的同时，社会主义也需要法律保护和法律制裁。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多数人不能靠法律，而要靠习惯，靠开会，靠文件。开会、文件属政策范畴，习惯属传统。政策和传统固然可以作为人们行动的规范，但它们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很大程度上带有弹性。法律则不然，具有强制性，是一种硬约束。毛泽东过分相信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

- 123 -

省的统计，有94个县是一县一社或一个大联社。人民公社还实行政社合一，政权机关与经济组织不分。这种规模和体制，在管理上引起很多混乱和漏洞。公社新建时，实行社一级所有制，把贫富不一的农业社统统拉平，社员自留地全部交公，公社无偿调拨社队的劳力、物资。在分配方面，实行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一平二调”、“共产风”日盛一日，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北戴河会议不仅在实际工作方面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方面也在一个长时期内造成很多失误。

比如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个问题上只提出过一些抽象的原则，并没有详尽地论证。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到底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开始这个过程，这是需要不断探索才能解决的，而且需要实践已经向人类提出这个问题时才能开始解决。显然，中国当时以至现在离这个问题还相当遥远。但是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却轻率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简单地把“产品丰富”和“共产主义精神”当作进入共产主义的两个条件，在他看来这两个条件在中国都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因此进入共产主义就成了并不遥远的事。这就在当时以至后来使我们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十分简单和狭隘，而且极易在这种对共产主义作图解的情况下产生幼稚和狂热的举动来。

又比如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资产阶级法权”是翻译的错误，这个词应译成“资产阶级权利”。这是马克思最早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来的，他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交换的原则叫做“资产阶级权利”。他认为这个原则和资本主义商品的等价交换中的等量劳动决定等量价值的原则是同一原则，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等量劳动交换的原则性质改变了，但形式还存在。马克思还指出，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的交换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包含着在劳动者中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如劳动者工作能力的不同，家庭负担的不同等等。这些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

- 122 -

的经验，而没有看到法制对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极端重要性。这在当时和后来也曾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法制建设历程。

当然，北戴河会议在总体上发展了左倾错误的同时，也包含一些积极的值得肯定的东西。比如，会议十分强调干部联系群众，提倡学校教育与实际相结合，要求领导干部及其子女防止特殊化，这些思想对于党的建设，对于干部队伍建设，对于改进学校教育和培养学生的情操与技能，都有值得借鉴的意义。因此，在研究它时，我们应该做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总结。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 124 -